

回忆与吴老的往事

马金双

(1955~)，中国科学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初次听到吴老的名字是1979年在东北林学院（现东北林业大学，哈尔滨）本科上《树木学》课，树木学老师黄普华教授介绍植被部分时提到即将出版的《中国植被》（1980，科学出版社）。后来上的《植物生态学》课及做毕业论文，经常翻阅并学习《中国植被》，对主编吴征镒感到非常敬仰。而真正第一次见到吴老则是1983年底，研究生时赴昆明参加云南省植物学会举办的生态地植物学讲习班。由于要去版纳，不得不把从东北来时穿的棉衣留在昆明，就找昆明所的陈书坤老师帮忙暂时存储一下。告知陈书坤老师在昆医（因为吴老不慎摔倒住院），当时只见到吴老躺在床上。第一次聆听吴老做报告则在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植物教研室（现并入北京大学）做博士生阶段。1986年10月《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在北京军事科学院招待所开会，晚上去看望东北林学院来的导师黄普华教授，正赶上吴老做九寨沟的考察报告。记得当时吴老放很多彩色幻灯片，很感慨。他们在九寨沟考察有很多新发现，包括忍冬属植物的一个新种。

1988年10月，中国植物学会在北京举行第55周年年会。《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副主编崔鸿宾和办公室夏振岱老师推荐《中国植物志》大戟科大戟属的作者，因为植物志要完成，但这个类群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作者。吴老问了我的基本情况后并没有立即允许我承担，而且提出要看我的博士论文。当时已经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东亚和南亚马兜铃属修订一文并投稿《植物分类学报》，于是将副本交给吴老审阅。吴老看后问可否将这篇文章投《云南植物研究》；但已经给了《植物分类学报》。于是吴老提出做大戟属可以，但希望以后大戟的文章要投《云南植物研究》。于是就有了后来大戟属修订的三篇文章都投给了《云南植物研究》的事情。当时对大戟属不了解，加之很多人都说大戟属很难，再说也没有做过的经验，于是请吴老掌舵，而且每篇文章吴老都亲自审理；他审稿非常认真，而且多次提出意见；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大戟属的三篇中文和一篇英文都是和吴老联名发表的原因。后来《中国植物志》44卷3册出版时，请吴老作共同作者，但吴老说我是主编，无论如何都要负责；作者就免了。用现在的时髦称呼，吴老那时是我真正不挂名的博士后指导教师，而且名字都不要！

1992年赴英国参加豆科会议，会后在邱园和爱丁堡植物园看标本，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吴老并在爱丁堡同吃同住一周左右，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记得当初从伦敦乘火车去爱丁堡，是德铎到车站接我到驻地。他当时正陪吴老在爱丁堡植物园的标本馆看标本。我就同他们一起住在一个华侨的公寓里。每天去标本馆看标本，累了就到植物园里看植物并拍照；吴老告诉我很多植物，包括从南美等地引种的植物，我几乎都不认识，而吴老能一一说出科属、学名及原产地。记得有天晚上我们谈到邱园刚出版的《Vascular Plant Families and Genera》（1992）和《Authors of Plant Names》（1992），特别是没有请中国人参与审核等，吴老非常严肃地说，那是偏见！我们做好工作，你们年轻人一定努力，争取早日赶上来！1993年在日本横滨参加国际植物学大会，吴老就说过我们中国人早晚会申办，关键看实力！吴老从前辈的手上接过接力棒，把《中国植物志》完成；同时发起并



承担了《中国植物志》英文修订版《Flora of China》的先期工作。如今，不但《Flora of China》完成，第十九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也在积极准备中（深圳，2017）！吴老九泉之下，一定非常欣慰。

1994年，《中国植物志》即将完成，但一些类群还没有达到交稿的要求。鉴于我很快完成大戟科大戟属的工作，吴老就让我协助我的博士导师诚静容教授进行卫矛科的工作；但是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我只承担了卫矛属的整理工作。这也是我成为《中国植物志》卫矛属的作者之一的原因（第一和第二作者分别为我的博士导师诚静容和硕士导师黄普华）。当然更是我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在从事卫矛属研究的缘由。

2004年到云南出差，在昆明所期间到家里看望了吴老；他嘱咐我一定做好卫矛属的工作，这个类群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否则其他人搞不清。正是吴老的嘱托，使得我能够继续从事这个类群的研究直至今天。2009年春天我经昆明赴印度调研，在周浙昆的陪同下去吴老在城里的家中看望，并获赠《百兼杂感随忆》（2008，科学出版社）。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2009年回到昆明工作，查找有关《东亚高等植物分类学文献概览》一书编写需要的资料，吴老嘱咐助理让我到他在所里的书房自己查找。我在吴老的书房里看了几天，不仅看到了吴老的全部收藏（不包括信件），更觉察到吴老的细心与敬业，真的非一般学者所能想象。吴老从来不丢弃任何信息，哪怕是一般的会议通知都保留下来。正是这样的收藏，才使我找到了《中国植物志参考文献目录》（中国植物志参考资料6，中国植物志植物中文名称；内部资料，1975）。该类资料在全国有关的图书馆都没有收藏（有的甚至当废纸卖掉）；问遍大江南北的专家学者，没有一个人保存。最后在吴老的书房里找到这个八开本的68页内部资料。它不仅记载了历史，更使得我们知晓《中国植物志》编写初期还是有这样的工作；如果坚持下来不至于后期出现中文名重名都不知道的现象。吴老留给后代的不仅仅是资料，更有珍贵的历史传承！

2013年吴老的遗体告别和追悼会我正在海外，很遗憾未能参加。今提笔记录过去作为不挂名学生的点滴，缅怀先生，并鞭策自己。



2009年9月14日拜访吴老

